

# 侵华战争期间水平社的战争责任

——以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为中心

华 兴

**[摘要]** 被歧视部落民是日本近代社会中遭受压迫程度最沉重的群体之一,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驱赶部落民移民到本土以外的设想得到进一步实施。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部落解放运动组织水平社沦为天皇制法西斯政府的政治工具,协助推动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煽动他们参与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与思考水平社协助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其中进步派与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对其整体情况的把握有利于全方位研究日本侵华史,深层次认识日本战争责任论的复杂性。

**[关键词]** 部落民 移民 水平社 战争责任

日本被歧视部落<sup>①</sup>源自封建身份制度中的贱民阶层“秽多”与“非人”。1871年明治政府颁布贱民解放令规定“秽多”和“非人”等同平民,但未能改变部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备受歧视的状况,部落歧视仍然根深蒂固地存续在日本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内务省领导下的融和运动<sup>②</sup>以实现“身份解放”与“消除贫困”为名,驱使部落民移民北海道、中国东北等地,将他们充作加强殖民统治与辅助侵略战争的人力资源,同时实现本土对底层贫困人口“净化”。在此过程中,部落解放组织水平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水平社由西光万吉、坂本清一郎等人在1922年创建,以反对歧视与压迫、改善部落民生存现状以及追求人权和尊严为目标,号召部落民以自身力量争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彻底解放。成立两年多时间内,水平社在日本各个府县成立了数百个支部,以燎原之火的势头在全国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成立初期,水平社在日本共产党员高桥贞树等人的带领下推行无产阶级斗争的运动道路,在国内联合日本工人组织、农民组织以及在日朝鲜人组织进行了多次反歧视反压迫斗争,在国际上提倡日本无产阶级联合中国劳农大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整体而言,水平运动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但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水平社在法西斯政权的压力下放弃了原有政治立场,协助融和组织推动部落民移民“满洲”,诱导他们投身“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关于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这一课题,围绕以改善部落民生存困境为出发点的融和运动如何与殖民侵略思想相结合,水平社如何被日本法西斯政权吸收与利用并推动移民等问题,日本学界取得了一系

<sup>①</sup> 解放令颁布之后,“秽多”和“非人”被冠以“新平民”“特殊部落民”等新的歧视性称谓,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井上清使用“被歧视部落”一词指代这一群体,“被歧视部落”的称谓如实表达出他们长期以来饱受歧视与压迫的境遇,因此被沿用至今。

<sup>②</sup> 日本政府在1910年以试图谋杀天皇的大逆罪名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曾在新宫市面向部落民发表演讲,因此被政府猜忌意图在部落民中招募反政府死士。“大逆事件”之后,部落民被视为对国家秩序有潜在威胁的群体,内务省开始统合各地以改善部落民生活为目的的民间组织,在“感恩明治天皇慈爱恩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融和运动,以怀柔方式阻止社会主义思想在部落民之间的传播。

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sup>①</sup>整体来看,日本学者长于考据,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较为详尽、系统。但是囿于立场的局限性,他们未能在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对部落民移民的历史原貌进行整体呈现,也没有从受害民众角度出发追究水平社的战争责任,因此缺乏客观、深层的批判。目前中国学界对水平社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侵华战争之前水平社表现出的进步性与积极意义,没有深入探究其战争责任,也未涉及水平社推动部落民移民的相关历史。<sup>②</sup>

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部落民移民的设想发展与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战后部落解放史研究者对水平社战争责任的评价,探究日本政府在扩张侵略过程中如何通过推动移民实现对部落民群体的最大化利用,剖析原本追求弱势群体人权的水平社如何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工具,以期深化对日本侵华史的认识以及对日本底层民众战争责任的探讨。

## 一、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始末

驱赶部落民移民到本土以外的设想肇始于18世纪末德川幕府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统治期间制定的北海道开发计划,德川家治的重臣田沼意次组织探险队对虾夷地进行开发考察,计划募集7万名部落民移居到虾夷地拓荒。这一计划因1786年德川家治去世、田沼意次被迫下台未能实施,但是利用部落民开拓疆土的设想在明治维新之后得到持续发展。19世纪80年代,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世界的行径,日本上层知识分子不仅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还产生了对帝国主义的向往。由于日本尚未完全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可能性,他们“避开欧美列强以及当时还很强大的清帝国,将扩张方向定在了南洋群岛,意图借助贸易与移民政策达到国力扩张之实质的侵略主义”。<sup>③</sup>这段时期主张往“南”发展的南进论引发了社会性关注,国粹主义者杉浦重刚是宣扬南进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构想由九万部落民组成军队,远征南洋群岛后建国<sup>④</sup>,主张在南进过程中转移部落民等底层人口。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为了彻底占领台湾,日本政府在占台伊始颁布了“威压岛民、驱逐台民、奖励日本人迁台”<sup>⑤</sup>的方针。部落民移民的设想在此策划下得到具体发展,如柳濑劲介在1901年提出了部落民移民台湾的方案:“现下台湾岛已入我国版图,占据此适宜我民族繁衍之地,是以可期达成吾愿。若幸得适宜之处,逐年迁徙二三或五六村落可得救赎之道,亦可为国镇守南门锁钥之地。”<sup>⑥</sup>柳濑的设想完全顺应了日本政府的对台统治方针,若部落民在台湾形成移民村,可从被歧视群体成为殖民统治阶级,还能促进台湾的日本化,亦可必要时充当兵源。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马关条约》中“朝鲜独立”的条款加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步伐,伴随着日本觊觎朝鲜和中国、意欲主导东亚秩序的野心不断膨胀,将部落民转化为有助于帝国扩张的人力资源这一设想也更加明朗化,南部露庵在《新平民论》中论述了部落民接受教育后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南洋大显身手的可能性。<sup>⑦</sup>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却未能像甲午战争那样得到巨额战争赔款,战争消耗和扩军费用消耗了大量国家财富,农村社会在连年的繁重课税下处于濒临

① 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有:青木孝寿「戦時下の部落問題Ⅱ」、『長野県短期大学紀要』、第38卷、1983年12月;大谷正「融和運動と満州移民」、『専修史学』第16号、1984年12月;廣岡浄進「越境する人の移動と被差別部落」,朝治武、黒川みどり等編『近代の部落問題』,解放出版社、2022年等。这些论著考察了部落民移民北海道、中国东北的历史过程,虽然承认部落民移民整体带有侵略殖民的性质,但没有探讨部落民移民的战争责任,也未从受害民众的视角展开论述。

② 例如吴建华指出侵华战争期间天皇法西斯主义迫使水平社支持侵华战争,但未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详见吴建华:《日本部落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日本问题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李凯航、俞祖成:《明治日本“南进论”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81页。

④ 杉浦重刚『樊噲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澤屋、1886年。

⑤ 孟月明:《试析日据时期对台移民及其危害》,《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89页。

⑥ 柳濑劲介『社會外の社會:穢多非人』,世界文庫、1970年、95頁。

⑦ 藤野豊『同和政策の歴史』,解放出版社、1984年、50頁。

瓦解的状态,处于最底层的部落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困境,内务省通过融和组织将部落民移民的设想付诸实践,在帝国公道会<sup>①</sup>的主导下,和歌山县、奈良县等地的部落民向北海道以及巴西等地小规模移民,大规模移民是在日本军部主导“满洲移民”之后。

日本学界将日本人集体移民中国东北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验移民期(1932-1935年);第二阶段正式移民期(1936-1941年);第三阶段移民事业崩溃时期(1942-1945年)。②第一、二阶段期间的移民政策兼具强化殖民统治为主、缓解日本农村经济危机为辅的双重目的,第三阶段的移民政策则是全面服务于侵略战争,不惜牺牲日本农村经济。中央融和事业协会<sup>③</sup>兼并帝国公道会后,进行了扩充、重组,负责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的具体事宜。实验移民期间,以退伍兵为主体的移民首先要参与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同时还是对苏防御作战的辅助者以及建立日本秩序的中坚力量<sup>④</sup>,因此部落民不符合这一阶段的选拔标准,实验移民期间的部落民移民尚停留在纸面计划。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要在20年内输送100万户共计500万贫困农民到中国东北,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满洲移民”不仅是解决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手段,更是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环节,因此灌输侵略殖民思想成为正式移民期融和运动宣传工作的总基调。1938年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组织了首次“满洲”视察会,参会者在《更生》以及《融和时报》上以社论、访谈等形式介绍移民团的建设状况,向部落民灌输移民对“发展五族协和之地,促进‘日满’亲善融和,守护东洋永久和平,稳固国家基础”<sup>⑤</sup>的重要性。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妄图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极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本政府不得不扩大兵源,大量符合移民标准的农民被应征入伍。此后《更生》及《融和时报》刊登了大量“消除歧视、摆脱贫困”等主题宣传,迫切希望吸引更多移民。与融和组织竭尽全力的宣传动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落民由于长期被束缚在固定居住地,极为依赖共同体生活,而且缺乏迁移资金,对移民到遥远的‘满洲’并无太多热情,例如1938年融和组织动员长野县下水内郡部落民家庭移民,40户只有两户响应。<sup>⑥</sup>

山之内靖指出:“在总体战体制下,除了经济资源必须全面动员人力资源支持战争,身处社会底层者便成了实行总体战体制的重大障碍,因为他们从未被立于负有社会政治责任之位置,故而缺乏推行战争的内在动力。”<sup>⑦</sup>从这一意义出发,在唤起部落民移民“满洲”、支持战争的积极性这一方面,1938年之后的水平社凭借其强大影响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立初期的水平社指出“移民北海道看似美好,实质是蒙蔽无知民众、遮盖歧视现象的驱逐政策”<sup>⑧</sup>,将融和运动的移民政策视为“怀柔政策的麻醉剂”<sup>⑨</sup>,斥责融和组织用移民遮蔽了造成部落歧视的社会根本症结。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水平社逐步丧失了斗争精神,在1938年4月总体战体制确立后全面屈从于法西斯政权。1938年11月全国水平社第十五次大会在“运动方针大纲”中增加了“希冀为日本民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作出贡献、协助推

① 成立于1914年的帝国公道会是当时最重要的融和组织。

② 浅田乔二:《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形成过程》,孟宪章等译,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③ 成立于1925年的中央融和事业协会与水平社相抗衡,目的是在国家主义思想指导下解决部落问题。

④ 浅田乔二:《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形成过程》,第10—12页。

⑤ 小山三郎「满洲移住」,『更生』第21号、1938年6月、2-4页。

⑥ 藤野豊『同和政策の歴史』,269页。

⑦ 山之内靖「方法的序論:総力戦とツスラム統合」,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ソ、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柏書房、1996年、11頁。

⑧ 「政府の追放の移民政策を排す」,『水平新聞』第5号、1924年10月20日。

⑨ 松浦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被差別部落」,松浦勉、渡辺かよ子編『差別と戦争』,明石書店、1999年、91頁。

行国策移民”<sup>①</sup>的内容,并指示水平社与各府县市町政府以及融和组织结为合作关系,此后各级水平社携手融和组织共同推动部落民移民。水平社创始人上田音市是三重县松阪市翼赞运动、皇民运动的主导者和“满洲移民”的积极推动者,他在1939年5月前往中国东北参加“满洲移民”视察会,回国后在三重县所属十四个地区担任“满蒙”开拓恳谈会的讲师,积极推动部落民移民。<sup>②</sup>兵库县神崎郡水平社干部清水喜市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部落民移民‘满洲’,还组织了兴亚亲民会等政治团体,为侵略政策擂鼓助威。<sup>③</sup>长野县水平社在1938年3月县水平社创立十五周年大会上改变了运动方针,积极响应举国一致的号召,为出征士兵解决后顾之忧,与融和组织结成亲密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满洲移民”,1940年长野县内22户部落民跟随第八次小古堂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组建了东乡村。<sup>④</sup>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日趋残暴,1942年1月,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的实施,水平社在法律层面消亡,大多数水平社领导者进入融和组织或翼赞组织,继续为法西斯政权效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劳动力的大量兵源化导致日本国内人力资源枯竭的状况日趋严重,但是为了获取战争资源与军事行动的便利,1942年日本政府继续强行实施“百万移民”计划,迫使移民承担防范苏联和粮食增产的重任。1943年后,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作战阶段,整个日本陷入战争泥沼。在此背景下,中央融和事业协会改组为同和奉公会,与原水平社领导人共同合作,竭力将部落民绑上军国主义战车。因此移民崩溃时期的部落民移民人数最多,山口县、高知县、熊本县、长野县以及兵库县均输送出相当规模的部落民移民。<sup>⑤</sup>

综上所述,将部落民迁移到本土之外的设想产生于狭窄国土与过剩人口之间的矛盾,伴随着日本对周边区域的吞并以及对邻国的侵略而逐渐具体化。侵华战争期间,部落民移民政策逐渐被对外侵略战争所吞噬,最终成为总体战体制中剥削底层民众的手段。从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战争高于一切”的总体战体制中,不仅初衷是人道主义救赎的融和组织彻底变质,曾经高举反法西斯旗帜的水平社也沦为进行战时人力资源动员的工具。原本在思想上处于对立状态的水平社与融和组织最终达成一致,即在对外侵略扩张中寻求解决部落问题。

## 二、部落民移民以及水平社的战争责任

有关部落民移民在中国东北具体生活状况的历史记载十分有限,现存资料可以明确的是,正如杉浦重刚、柳濂劲介等人所设想的,部落民在中国东北摇身成为殖民统治者,他们在关东军和日本警察的护卫下掠夺土地、侵占房屋、奴役中国农民。据1940年2月刊登于《融和时报》的社论《关于我村在满洲的分村》记载,和歌山县某村14户计30余人移民到“满洲”后,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继续移民50户,因此通过满拓公社自由移民课以低价收购了土地数百町步以及三十户当地农民的房屋。<sup>⑥</sup>根据部落民移民回忆录编著的《血色的黄土》记载,以熊本县鹿本郡来民町部落民为主体的来民开拓团来到吉林省扶余县五家站镇之后,强行收购了当地农民的土地、房屋以及所有生活设施,迫于关东军的武力威胁,当地农民无法反抗,被迫成为日本移民的苦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来民开拓团的多名部落民应征入伍,作为侵略军士兵直接参与到侵略战争中。<sup>⑦</sup>曾经受雇于来民开拓团的中国农民赵有峰指出,开拓民在适

① 全国水平社総本部『第十五回全国大会報告並議案書』、1938年11月、8頁。

② 藤野豊『水平運動の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雄山閣出版社、1989年、279頁。

③ 大谷正『融和運動と满洲移民』、『専修史学』第16号、1984年12月、134頁。

④ 秋定嘉和、朝治武編『近代日本と水平社』、解放出版社、2002年、241頁。

⑤ 馬原鉄男『新版・水平運動の歴史』、部落問題研究所、1992年、152頁。

⑥ 野口道彦『ディアスポラと部落問題、そして移民問題』、野口道彦、戴エカ、島和博編『批判的ディアスポラ論とマイノリティ』、明石書店、2009年、291頁。

⑦ 部落解放同盟熊本県連合会編『赤き黄土:地平からの告発来民開拓団』、部落解放同盟熊本県連合会、1988年、21頁。

应当地生活后便以统治者自居,雇佣中国人苦力承担所有沉重繁琐的农活,欺压中国人的行径日益严重,经常施以辱骂与殴打。日本战败后,来民开拓团成员在撤离、变卖财物的过程中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他们以活埋、刀砍等残忍方式杀害、打伤了数名中国农民。<sup>①</sup>中日双方的证词,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揭露了部落民移民在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

上述部落民移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此外,作为对部落民群体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水平社在侵华战争期间对部落民的政治引导与思想教育负有重大责任。1937年3月水平社第十四次大会的运动纲领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同月25日,全国水平社书记长井元麟之和常任书记酒井基夫因与日本共产党中央重建预备委员会关系密切遭到逮捕<sup>②</sup>,这是导致水平社转向的重要事件。6月29日,松本治一郎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邀请此前脱离水平社的西光万吉、阪本清一郎等国家主义者重回水平社。7月4日的干部恳谈会中,常任中央委员泉野利喜藏提议清除组织内的左派成员,试图将水平社引导到能被国家权力认可的轨道,并提出“相较聆听百遍左派分子的‘主义’,换取一个面包才是当务之急”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sup>③</sup>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获取战争扩大所需的人力与物资,近卫内阁于8月24日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要求“增加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战事如何延长,都要以坚忍持久的精神克服困难达到目的。”<sup>④</sup>仅在半月之后,水平社于9月11日召开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中确定了“非常时期的运动方针”,宣布为达到实现举国一致的目标,水平社中止反歧视纠弹斗争,以“救援出征士兵的家人”为基础活动<sup>⑤</sup>,此次会议标志着水平社卸下反法西斯革命旗帜,开始转向支持侵略战争的立场。

1938年4月近卫内阁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本法为国家总动员是在战时为达到国防目的,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国家总能力。”<sup>⑥</sup>随后水平社在1938年6月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中修订了运动纲领,提出“吾等将贯彻国体之本义,为国家的兴隆作出贡献,以期完成国民融和,以殉国的觉悟积极参加国家总动员、强化举国一致体制。”<sup>⑦</sup>1937年文部省发行的《国体本义》指出,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统治中心的体制是日本万古不易的神圣国体,臣民之道在舍我去私、亿兆一心唯奉天皇,《国体本义》将国民视为天皇的臣民,抹杀了个体的自主精神与存在价值,是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将“贯彻国体之本义”纳入纲领意味着水平社丧失了追求独立、平等的自主精神,全面接受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变。另一方面,《国家总动员法》将所有经济、政治、军事活动置于国家统治之下,以服务战争为目的,积极参加国家总动员表明水平社忠实执行极端国家主义政策,自觉投入总体战国家体系之内。

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政治附庸之后,水平社协助战争的主要行为可以概括为:全盘肯定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积极支持侵略战争;歪曲造成部落歧视的根本原因建构出部落民从殖民统治、侵略战争中获得身份解放的理论;煽动部落民移民中国东北强化殖民统治。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占广州以及武汉之后,1938年11月12日发行的《全水大会新闻》刊登了为日军摇旗呐喊的报道:“忠勇无比的皇军……如疾风迅雷般攻陷广州后,威风凛凛地征服了武汉三镇,向世界绽放光辉,吾等国民对此不胜感激

① 赵有峰等口述,于金廷整理:《五家站日本来民开拓团自焚追记》,吉林省扶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扶余县文史资料》第5辑,扶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版,第14—25页。

② 朝治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全国水平』,解放出版社,2008年,25页。

③ 朝治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全国水平』,26页。

④ 吉見裕、吉見義明編『資料日本現代史 1 日中戦争期の国民動員』,大月書店,1984年,46—47页。

⑤ 全国水平社総本部『第十五回全国大会報告並議案書』,1938年11月,1—7页。

⑥ 吉見裕、吉見義明編『資料日本現代史 1 日中戦争期の国民動員』,47—48页。

⑦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水平運動史の研究』第4卷、部落問題研究所,1973年,157页。

……为达成举国一致的目标吾等将展开反歧视国民运动,响应国民精神总动员迈向历史大业”<sup>①</sup>,显示出水平社在支持侵略战争方面不甘人后的积极性以及强化战争动员的决心。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宣布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统治中心的“新秩序”,近卫内阁智囊机构核心人员蜡山政道发表了作为实现“新秩序”实现手段的“东亚协同体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确立霸权的行动制造理论根据。11月23日水平社第十五次大会积极呼应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要依靠民族协和建设东亚协同体,解放诸民族,确立东亚永远的和平,在迈进新秩序建设过程中从根本上解决部落问题,彻底充实部落大众的生活、增进福祉”<sup>②</sup>,可以看出水平社主动参与“新秩序”理论化工作,不仅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建立霸权的行动解读成将东亚从英美等国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正义之举,并且通过歪曲部落解放的意义将自身参与战争利益分配的目的合理化,最终使部落解放理念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融为一体。

水平社成立初期,高桥贞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部落问题作出分析,他指出部落歧视不仅是封建残余,还在资本权力的操控下成为阶级榨取的工具<sup>③</sup>,这一观点被继任领导人所继承,直至“七七事变”前夕一直是水平社进行民主主义斗争的理论依据。水平社第十五次大会中,以松本治一郎为首的水平社领导人否定了一直以来的理论依据,将造成部落问题的根本原因曲解为“普通民众内心深处基于经济与文化原因的歧视观念”<sup>④</sup>,这与融和组织“移民满洲即能摆脱歧视”的理论相呼应,如下村春之助认为,“满洲”不存在歧视在于“土地均分、五族协和的平等理念、互帮互助的大陆生活习气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sup>⑤</sup>水平社与融和组织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广大部落民参与到“百万移民”计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对部落民进行美化殖民统治的虚假宣传,声称“留在本土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贫苦生活,在‘满洲’只要努力就能成为20町步(1町步约为9900平方米)的地主”<sup>⑥</sup>,“驰骋于‘满洲’新天地须以服从国家百年大计为先,迸发出心系祖国安危的日本农民魂之热情”<sup>⑦</sup>等,最终使部落民深信,通过移民“满洲”侵占他国土地、奴役他国民众是摆脱歧视的正当途径和忠君爱国的表达方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水平社领导人向部落民灌输对中国人的民族蔑视观,以此否定水平社成立初期提倡的与中国劳农大众的连带意识,促使他们从思想上转变成侵略者,动员他们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如西光万吉1939年9月从中国东北回国之后发表社论,将东北农村儿童形容为从泥土中爬出来的两脚虫,东北农村的房屋仿佛土粪一般<sup>⑧</sup>;1939年8月,从中国华北回到日本的坂本清一郎呼吁部落民:“应紧紧掌控邻邦华侨之资本,勇于在(中国)大陆开发畜产资源以慰靖国之英灵。”<sup>⑨</sup>

此外,水平社领导人也直接参与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例如1939年11月松本治一郎作为“众议院慰问皇军代表团”的一员前往中国战场慰问侵华日军<sup>⑩</sup>,1943年松本治一郎作为众议院议员还参与了推动朝鲜人征兵制度的实施,强征中国和朝鲜劳工制度的制订等<sup>⑪</sup>,1945年4月井元麟之应征入伍日本驻朝鲜军。<sup>⑫</sup>

① 金静美『水平運動史研究 民族差別批判』、現代企画室、1995年、131頁。

② 金静美『水平運動史研究 民族差別批判』、132-133頁。

③ 高橋貞樹『被差別部落一千年』、沖浦和光校注、岩波書店、1992年。

④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水平運動史の研究』第4巻、467頁。

⑤ 下村春之助『満洲に住めば差別は解消する』、『更生』第38号、1941年6月、2-7頁。

⑥ 木藤岩雄『満洲の横顔』、『融和時報』第5巻第156号、1939年11月、269頁。

⑦ 野口道彦『ディアスポラと部落問題、そして移民問題』、297頁。

⑧ 西光万吉『西光万吉著作集第二巻』、涛書房、1974年、254-257頁。

⑨ 白井寿光『戦時統制下の和膠業(4)——阪本清一郎の動きを中心に』、『部落解放研究』第89号、1992年12月、148頁。

⑩ 『衆議院北支派遣軍慰問議員団』、『大阪朝日新聞』1939年11月2日。

⑪ 金静美『水平運動史研究 民族差別批判』、355-359頁。

⑫ 米田富、井元麟之等『水平運動よもやま話 下』、解放出版社、1982年、26頁。

20世纪30年代,在天皇制法西斯政权日益严酷的镇压下,水平社坚持原有的政治立场异常艰难,因此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水平社被认为是受到法西斯政权胁迫不得不协助了战争。但从其转向过程及协助战争的行为可以看出,水平社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不容忽视,其生成逻辑值得深究。水平社将侵略战争和部落解放的目标合二为一的思想基础,是近代天皇制一君万民的国体,即以主体积极性向天皇尽忠的万民不分贵贱尊卑,人人平等。他们将解决部落问题与效忠天皇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把摆脱歧视与贫困的希望寄托在侵略其他民族的基础上。水平社成立初始,并未就如何实现部落解放这一目标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净土真宗思想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并存的现象。例如创立人员西光万吉、坂本清一郎及米田富等国家社会主义者提倡在天皇制国家体制下实现共产主义,尽管水平社大多数领导人一直与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他们未对组织内部的天皇崇拜观念与臣民意识进行彻底清算,在反歧视运动中,将歧视部落民的行为定义成违背明治天皇“圣旨”之逆举进行弹劾的事例并不少见。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高涨到无以复加的时代背景下,水平社领导人最终与西光万吉等人殊途同归,他们主动迎合“皇国中心主义”,期待从“圣战”中获取现实利益、在“东亚新秩序”中得到殖民者身份,最终带领部落民成为侵略者,以一种比自身遭受的歧视更加残酷的方式对待被侵略国家的人民。

概言之,侵华战争时期,水平社领导人认为跟随法西斯政权是保障部落民群体生存的现实途径,他们放弃了进步的民主主义理想,主动靠近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利用部落解放理念为侵略战争做合理化辩护,为部落民描绘出“通过移民‘满洲’获得身份解放,摆脱贫困生活”的虚假蓝图,积极为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进行思想造势与人力动员,成为法西斯政权的帮凶,试图在一君万民的思想框架中获取作为日本国民的同一性。天皇制法西斯政权与水平社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前者动员后者参与到战争利益的分配之中,并在殖民帝国版图内赋予后者作为日本国民的“平等”,而后者将部落民群体推入总体战体制,支持并强化了前者的持续运行。

### 三、战后部落解放史研究中的战争责任探讨

高桥哲哉指出:“日本国民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日本发动的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sup>①</sup>水平社以及在其领导下踏上中国土地协助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部落民移民,理应负有相应的战争责任。由于东京审判保全了以天皇为首的部分日本统治阶层,将战争责任转嫁给军部,制造出军部不顾天皇以及民众的反对强行发动了战争的历史认知,扭曲了日本民众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致使大多数日本民众不能意识到自身的战争责任,反而产生了强烈的受害者身份意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主要是清算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尽管部落解放史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得到了显著发展,其中绝大多数是呈现水平社反歧视斗争、联合工农进行反压迫斗争等光辉的一面,以及揭示部落民在战争时期遭受的苦难,从战争责任的角度探讨部落民移民以及水平社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20世纪60年代后期,声势浩大的安保斗争、反公害运动尤其是反对日本政府支持越战的抗议促使日本民众开始正视侵略历史的真相,例如本多胜一以报告文学的方式揭露了平顶山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sup>②</sup>,日本学界围绕战争责任的观点随之发生变化,井上清提出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sup>③</sup>,日本民众建立在“不追究天皇和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基础上的受害者意识开始动摇,部落解放

① 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本多胜一『中国の旅』,朝日新聞社、1972年。

③ 井上清『天皇の戦争責任』,現代評論社、1975年。

史研究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藤谷俊雄、马原铁男等人的著作呈现了侵华战争期间水平社协助战争的历史事实,但未从战争责任的角度进行批判。<sup>①</sup>上杉佐一郎<sup>②</sup>在回忆录中承认曾数次对无法撤退的中国妇人和孩童施以暴行,但是他将自身罪责归咎于军队的战争政策。<sup>③</sup>师冈祐行指出作为水平社后继组织的部落解放委员会回避了战争责任的问题<sup>④</sup>,这是战后部落解放运动史研究中首次提及水平社的战争责任。

1985年家永三郎强调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参与侵略战争的事实,并在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之上提出了道德责任。<sup>⑤</sup>高桥彦博则进一步主张,主动或被动参与和支持侵略战争的民众都不能回避自身的战争责任。<sup>⑥</sup>在日本进步派学者重建“加害者”意识风潮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换。1988年至1989年之间,部落史研究者对前述来民开拓团“记忆”的发掘,开启了日本学界对部落民移民以及水平社战争责任的集中探究。由于被关东军抛弃,1945年8月17日,除却此前应征入伍者以及幸存者宫本贞喜,来民开拓团270余人在绝望中集体自焚身亡。<sup>⑦</sup>藤原惠、大谷正、朝治武等学者明确指出来民开拓团的侵略性质,认识到悲剧的产生与日本侵华战争有直接关系,对悲剧背后的政治力学关系作出了深入的追溯与批判<sup>⑧</sup>,并未停留在表面伤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来民开拓团当事者的回忆中,虽然作为加害者的悔悟有所流露,整体上还是充斥着强烈的被害者意识。例如丰田实谴责了抛弃开拓民的“在满”日本官员,将中国农民的“袭击”归结于伪满政府和关东军的高压殖民统治政策。<sup>⑨</sup>整体而言,来民开拓团当事者的回忆多在悲情叙事的基调中谴责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强调自身遭受的苦难,却鲜有提及他们对当地中国农民的压迫与榨取。例如谷川竹行反省了开拓民强行收买当地农民土地、房屋的行径<sup>⑩</sup>,但对其更为恶劣的罪行如在日常生活中压迫中国农民、在自决之前残忍杀害中国农民的事实却隐而不提。尽管幸存者的证言有拒绝遗忘的姿态,但在“真实”回忆中遮蔽了关于战争犯罪的部分,在“深刻”反省中规避了对战争责任的正视,将具体的战争责任从个体身上抽离,勾勒出部落民移民在法西斯主义和部落歧视下的双重受害者形象。

这种在“被歧视者”身份保护下将自身与战争责任割裂开来的逻辑,同样存在于围绕水平社及其最高领导者松本治一郎的战争责任的探讨中。《部落历史与解放运动》设定的评价框架是“水平社在法西斯镇压下不断衰退最终被迫协助战争的同时依旧顽强抵抗”<sup>⑪</sup>,以此为前提,藤野丰从天皇制法西斯论的角度梳理了部落解放运动与侵略战争的关联,他指出朝田善之助、北原泰作等人发起的部落厚生皇民运动派从属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动员体制,扮演了战争动员推行者的角色,以此营造出松本治一郎在法西斯政权掌控全社会之时势裹挟下违心支持战争的思想困境,最终得出松本“为守护部落民不得已利用了战时体制”<sup>⑫</sup>这一历史虚像。

① 藤谷俊雄「戦時下の水平運動」、部落問題研究所編『水平運動史の研究』第6巻、部落問題研究所、1973年、107-142頁;馬原鉄男「戦時体制下の水平運動」、「新版・水平運動の歴史」、部落問題研究所、1992年、141-179頁。

② 上杉佐一郎在1982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部落解放同盟中央执行委员长,他在1940年4月应征入伍福冈第24连队第2机关枪队,同年4月出征中国。

③ 上杉佐一郎「部落解放と労働者」、解放出版社、1976年、47頁。

④ 師岡祐行「戦後部落解放論争史」第1巻、柘植書房、1980年、34-35頁。

⑤ 家永三郎「戦争責任」、岩波書店、1985年。

⑥ 高桥彦博「民衆の側の戦争責任」、青木書店、1989年。

⑦ 村上親二「一日も早い遺骨収集を」、大阪人権歴史資料館編『満洲移民と被差別部落:融和政策の犠牲となった来民開拓団』、大阪人権歴史資料館、1989年、3頁。

⑧ 大阪人権歴史資料館編『満洲移民と被差別部落:融和政策の犠牲となった来民開拓団』、大阪人権歴史資料館、1989年。

⑨ 豊田実「来民開拓団集団自決の真相」、「満洲移民と被差別部落:融和政策の犠牲となった来民開拓団」、20-26頁。

⑩ 谷川竹行「来民開拓団に思う」、「満洲移民と被差別部落:融和政策の犠牲となった来民開拓団」、27-29頁。

⑪ 部落問題研究所編『部落の歴史と解放運動 近・現代編』、部落問題研究所出版部、1986年、375頁。

⑫ 藤野豊「水平運動の社会思想史的研究」、337頁。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京审判等战后审判中未得到解决的“慰安妇”问题因幸存者的公开控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战争责任问题的国际化和政治化迫使日本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加害者身份。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对日本在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中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反省,促使日本对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进行进一步思考。这一时期关于水平社战争责任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进展,在日朝鲜裔历史学者金静美从中国、朝鲜等国受害民众的角度出发,以丰富确凿的史料还原了战时水平社在松本治一郎带领下“全面接受天皇制意识形态,推动部落民移民‘满洲’,煽动部落民参与侵略战争,在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中谋求部落解放”的实像,以及部落民群体的战争责任,“绝大多数部落民对自己作为皇军士兵在亚洲各地的所作所为集体沉默,这与松本治一郎协助战争的事实被隐瞒并被誉为‘解放之父’之间并非没有关联。”<sup>①</sup>尽管一些日本学者不认可此种观点<sup>②</sup>,金静美的研究仍在部落解放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根本上撼动了部落史研究者对水平社战争责任认识的总体框架,为学界开展后续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论据。翌年《部落解放》杂志发行的特辑《战败五十年与全国水平社》在战后日本历史界与思想界的整体场域集中讨论水平社的战争责任,渡边俊雄提出,部落史研究者要深刻反省在战后五十年的当下还未能厘清水平社战争责任这一事实。<sup>③</sup>这次讨论直接促使1997年部落解放同盟在官方文件中公开承认“水平社曾经协助了侵略战争”,这对于进步派学者继续追究水平社的战争责任具有推动性作用。

新旧世纪之交,在日本社会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逐渐保守化和右倾化的环境下,水平社战争责任这一课题的持续深入研究仰赖于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努力。在金静美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松浦勉论述了侵华战争期间松本治一郎带领下的水平社如何以“民族协和”之名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之实,批判藤野丰描绘的“水平社在战时体制下依然坚持抵抗”的形象是缺乏历史分析的主观评价。<sup>④</sup>朝治武系统梳理了战争期间水平社纲领、宣言以及运动方案的修订过程,考察了水平社如何在思想理论层面将部落解放与协助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sup>⑤</sup>,并且提出身为近现代部落史研究者的战后责任,提倡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与中国、韩国以及朝鲜等亚洲受害诸国充分对话的基础之上,如果局限于日本一国或者部落解放的视角与立场,必定以徒劳告终。高桥哲哉将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容貌”的说法解释为只有面对他者的痛苦才能促使人类反省自身的暴力,提出“不首先面对亚洲死者的话,‘我们日本人’这一概念无法建立”<sup>⑥</sup>,因此对于来自国外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本人需要予以“应答”。从朝治武编著的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出<sup>⑦</sup>,他在战争远去的当下,仍然坚守着一份“应答”的战后责任。

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围绕水平社战争责任的探讨、论战和交锋,体现出日本思想界战争责任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从不同视角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其内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研究结论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能够正视日本侵略历史,其集体研究明确了水平社运动的法西斯化过程,并进行了学理上的剖析与批判,尤其是金静美、松浦勉以及朝治武等人揭露真相、捍卫真理的学术活动体现出良知与正义的精神,但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具体战争罪行只能依赖当事者

① 金静美『水平運動史研究 民族差別批判』、404頁。

② 例如藤野豊批評金静美の研究以告発の姿列挙事實、は単純幼稚の戦争責任論、詳見藤野豊「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水平運動—『部落厚生皇民運動』再論」、『部落問題研究』第116号、1992年5月、27-29頁。

③ 渡边俊雄「今なぜ、全国水平社の戦争責任か」、『部落解放』第393号、1995年8月、17頁。

④ 松浦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被差別部落』、『差別と戦争』、77-79頁。

⑤ 朝治武「戦時下全国水平社と新生運動」、『水平社歴史館研究紀要』第1号、1999年3月;朝治武「戦争責任と部落解放運動史」、『部落解放』第553号、2005年8月、27-28頁。

⑥ 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第132頁。

⑦ 朝治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全国水平』、解放出版社、2008年;朝治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部落問題」、黒川みどり編『部落史研究からの発信 近代編』、解放出版社、2009年。

的个人叙述,而绝大多数水平社成员对自身作为侵略者的所作所为不愿置喙,因此战争责任的研究无法落实到个体身上,同时又缺乏受害国民众的视角,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为“责任的问题,若不能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民族道德颓废的历史往往只能被架空为历史‘经验’,而非‘教训’。对每一个个体‘恶’的审视,与对每一个受害者的尊重是互为表里的。”<sup>①</sup>其次是部分研究者存在着如是倾向:他们过于强调部落解放运动受法西斯政权戕害的受害者立场以及水平运动整体所秉持的正义属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水平社及部落民群体应负战争责任。换言之,他们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等被侵略国家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缺乏深刻的历史认识和主体性的反省。

## 结 语

自近代以来,日本陆续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策划、实施的部落民集体移民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的一环,被迫移民的部落民群体是帝国主义和部落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同时也是协助侵略战争、强化殖民统治的加害者。从移民人口数量来看,部落民移民的作用有限,但必须明确的是,即使是殖民者内部的弱势群体,部落民移民带给中国人民的伤害也不应遗忘,不能因人数较少便予以免责,水平社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帮凶角色不容忽视。围绕水平社的战争责任,进步派学者进行了深刻反省,为中日两国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部落民长期受到多重压迫,在战争期间所受伤害的程度远胜普通日本民众,部分日本学者存在着以“迫不得已而为之”为理由将水平社的战争责任虚化的倾向,致使其战争责任最终失去具体落脚点,其相关研究也表现为一种缺乏现实关怀与普遍正义的“学术中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粉饰“慰安妇”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试图逃避战争责任,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中日两国诸多方面的历史认知迟迟不能互洽。因此,在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细化、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探究水平社以及部落民移民的战争责任,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对水平社战争责任的认知,有助于为日本战争责任的实证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从新的视角认识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华 兴: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210033]

[责任编辑:汪海涛]

<sup>①</sup> 王升远:《壑声、峰影与中间地带》,《读书》2022年第11期,第133—134页。